

【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

毛泽东在“三农”问题上的理论贡献与实践得失

郭玉亮

(华东师范大学 政法学院,上海 200062)

摘要:建国后,毛泽东在探索解决“三农”问题上投入了极大精力,做出了一定的理论贡献并取得了重要成就,但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又有一些失误与不足。总结其经验教训,为我们今天解决“三农”问题提供借鉴和启示,是对伟人毛泽东的最好纪念。

关键词:毛泽东;“三农”问题;理论贡献;失误与不足;借鉴和启示

中图分类号:A8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03)04-0031-05

The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and Practical Gain and Lost on the Three Problems Related to Agriculture by Mao Zedong

GUO Yu-liang

(School of Politics and Laws,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na, Mao Zedong put a great deal of energy into the search and settlement of three problems related to agriculture and made a certain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 and obtained a certain achievement as well. But in practice, there exists some shortcomings also. This paper sums up his experiences and lessons in order to offer some help and inspiration to our today's settlement of three problems related to agriculture. In this way, it commemorates the GREAT man Mao Zedong mostly.

Key words: Mao Zedong; three problems related to agriculture;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 shortcoming; inspiration

建国后,毛泽东高度重视“三农”问题,积极探索解决的办法,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如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农业就是工业,重工业要以农业为重要市场;工农业同时并举,安排国民经济计划要以农轻重为序;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减轻人民负担,借以休养民力;农民是建设工作中一支最伟大的力量;加强农村教育,提高农民素质;争取和依靠农民就必须调查农村等。在理论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农业观、农村观和农民观。但在实践上,由于实行城乡隔绝政策、农村经济政策、不平衡的区域发展政策以及消极的人口政策,都在某种程度上对农村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尤其是推行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以及接踵而至的“文化大革命”给农村经济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使本来贫困的农村变得更加贫困。总结这一时期的经验教训,对今天解决“三农”问题很有裨益。

一、毛泽东在探索解决“三农”问题上的理论贡献与成就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马克思从分析社会发展进程中揭示的客观规律。其论据为:从农业部门的特点来看,农业是生产食物的部门,而“食物的生产是直接生产者的生存和一切生产的首要条件”^[1];从农业部门和其他非农业部门出现的顺序来看,首先是农业,然后才有其他部门。“最文明的民族也同最不发达的未开化的民族一样,必须先保证自己有食物,然后才能去照顾其他事情”^[2];从农业和精神生产部门的关系来说,诸如文化、艺术等等

收稿日期:2003-05-23

作者简介:郭玉亮(1978-),男,上海人,华东师范大学政法学院中共党史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执政党的建设研究。

的独立化和发展,也要依赖于农业。马克思说:“社会生产小麦、家畜等等所需要的时间越少,它对于其他生产,不论是物质的生产或精神的生产所获得的时间便越多”^[3];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马克思有一句名言:“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1]。总而言之,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但马克思还没有把这一客观规律明确地概括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列宁前进了一步,明确指出“农业是俄国国民经济的基础”^[4]。但列宁只是就俄国经济情况而言的,并没有指出这一规律的普遍性。后来斯大林也讲过“要建设工业就应当从农业开始和工业是主导,农业是工业基础的话”^[5];但在实践上却把农业挖得很苦。

毛泽东在社会主义的建设实践中,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的原理。在《论十大关系》中,精辟地论述了农业的重要性以及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1960年在他指示起草发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党动员,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中,“明确地作了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的概括,准确地表述这一规律的普遍性”^[6]。在农业和工业的关系上,不仅明确地提出了工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而且明确地提出了安排国民经济计划要以“农轻重”为序。在积累和投资的问题上,总结了苏联挖农业很苦的教训,提出了不能挖农业太苦。在农业生产结构上,提出“粮食是基础的基础”,农林牧副渔要全面发展等重要思想。

建国后,毛泽东特别强调“全党一定要重视农业”,因为“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7]。在农业中,毛泽东尤其重视粮食生产。在1957年1月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他告诫全党:“要注意,不抓粮食生产很危险。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为了发展农业生产,毛泽东曾作了许多具体的论述:如增加对农业的投资。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我们现在的問題,就是还要适当地发展农业、轻工业的投资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农业、轻工业投资的比例要加重一点”。他认为,这样不仅可以加快农业生产的发展,而且可以使“投到重工业方面的资金也会更多些”,从而“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减轻农民的负担。毛泽东认为,“不顾人民困难,只顾政府和军队的需要,竭泽而渔”^[8],是错误的。他要求赋税的负担不能伤民,“先让农民吃饱一点”,使“农业本身积累多”。让农民承担一定赋税是必要的,但是“一

经有了办法,就要减轻人民负担,借以休养民力”;工业要为农业服务。要加速发展农业,从而同时达到加速发展工业的目的,首先“要说服工业部门面向农村,支援农业”;改良农业技术。毛泽东深知科学技术对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要性,极力提倡选种、改进耕作方式,提出了“农业八字宪法”(即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对实现科学种田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实践证明,毛泽东把发展农业生产,摆在经济建设工作的第一位,是符合我国的国情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的。他要求全党重视农业,特别是要大力发展农业的思想,至今仍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毛泽东提出了“农业就是工业”的命题。毛泽东认为,农业关系城市和工矿区人口的吃饭问题。商品的农产品发展了,才能供应工业人口的需要,才能发展工业;农业是轻工业原料的主要来源和销售产品的重要市场。只有农业发展了,轻工业生产才有足够的原料,轻工业的产品才能得到广阔的市场;农业又是重工业的重要市场。化学原料、农业机械等将以农村为销售对象,电力、煤炭、石油等行业的很大一部分产品也将销往农村,公共设施中的一部分必须供应农村需要,如此等等;现在出口物资主要是农产品。农产品变成外汇,就可以进口各种工业设备;农业是积累的重要来源。农业发展起来了,就可以为发展工业提供更多的资金。由此他得出结论:在一定意义上农业就是工业。

1957年毛泽东又提出了“重工业要以农业为重要市场”,这一命题既指明中国工业化道路,又丰富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实践论。毛泽东立足于经济建设长远发展的高度,提出了重工业要以农业为重要市场,从而使工业发展建立在牢固的农业基础之上,以实现国民经济持续稳定高速发展。从这里可以看到毛泽东把辩证法运用到经济建设之上。国民经济两大部门:工业和农业,中国实现工业化的道路,并不是片面去加强工业这一方面,而是工业要依靠其对面的农业,把农业作为自己的市场。这样,国民经济这一事物的两个方面就在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推动下,加速了发展。

1959年4月,毛泽东在《党内通讯》中提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的论断。并指出,“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还要求“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9]。他痛切地谈到:中国有五亿多人口从事农业生产,每年劳动而吃不饱,这是最不合理的现象。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他指望在农村大办工业,实行农业机械

化。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建国后,为改变农业生产的落后状况,国家建立起专业农具厂,成批生产新式农具。在第一、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内,新建和扩建了一批生产柴油机、脱粒机、联合收割机和机引农具的工厂;从总体说毛泽东抓住现代农业的特点,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学说,即生产工具是划分经济时代重要标志的观点;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的观点。从发展方向上看是正确的。

建国后,毛泽东首倡土地改革,实现了“耕者有其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为了改变个体经济的弊端,毛泽东又倡导建立农村合作社,组织起来走集体化的道路,并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社会主义合作化。这是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客观要求,是农村自身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客观需要,也是农民共同富裕和巩固工农联盟的需要。只有把分散的个体经济改造为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才能使农村生产力获得更快的发展,农民生活得到更多的改善。因此,发展互助合作运动不断提高农业生产力,是中国农村发展的需要。

建国后,毛泽东反复强调了农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作用。1950年9月,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闭幕词》中说:中国的主要人口是农民,革命靠了农民的援助才取得了胜利,国家工业化,又要靠农民的援助才能成功。1958年5月,毛泽东在修改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政治报告时,又特别强调农民的作用。他说:在我国的6亿多人口中有5亿多农民,他们无论在革命中和建设工作中都是一支最伟大的力量,我们无产阶级只有依靠这个伟大的同盟军,把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调动起来才能取得胜利。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科学地论述了国家同农民的关系,并指出:“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鉴于苏联推行义务交售制把农民挖得很苦,严重挫伤农民积极性的做法,他主张要“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在工农业产品交换中,要“采取缩小剪刀差,等价交换或近乎等价交换的政策”,“在合作社的收入中,国家拿多少,合作社拿多少,农民拿多少以及怎样拿法,都要规定适当。”这对于纠正中国社会主义

建设中重积累轻消费的倾向,改善人民生活特别是农民生活具有重大意义。

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精辟地指出:“我国有5亿农业人口,农民的情况如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这是因为,农民的经济状况如何,对于工业的发展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影响极大。农民的政治状况如何,关系到整个社会的稳定和政权的巩固。建国以后,由于我们党在农村紧紧地依靠农民,重视农民工作,因而我国的农村社会秩序是稳定的,基层政权是巩固的。尽管在十年动乱中,由于林、江反革命集团的挑动,在部分城市一度出现过混乱,但整个农村基本上是稳定的,因而我们国家也是稳定的。毛泽东还十分重视加强农村教育,提高农民素质。鉴于中国农民中文盲很多,因而他认为发展农村教育的首要任务是扫盲。建国初期在毛泽东的关怀下,农村举办了农民夜校,开展扫盲运动。毛泽东关于加强农村教育,提高农民素质的理论和实践,对于培养农村人才,提高农民的思想文化素质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毛泽东在处理“三农”问题上,所采用一个重要方法就是调查研究。他在向拉美客人介绍经验时,精辟地指出:要争取和依靠农民就必须调查农村。他反复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做懂行的领导者和管理者,要逐步认识农业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不断提高领导和管理农业的水平。毛泽东认为,我们办社会主义农业经验不足,要一年一年的积累经验,在实践中探索它的规律性。为此,他号召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一定要下一番苦功,要切实实地深入农村,调查研究。毛泽东指出:“像党的总书记这样主要的领导人,要亲自动手,了解一两个农村”,“总书记调查一两个农村,心中有数了,就可以帮助同志们去了解农村,弄清农村的具体情况。”^[7]只有这样,才能掌握领导农业经济的主动权,切实加强和改善对农业的领导和管理。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和方法对我们今天解决“三农”问题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毛泽东解决“三农”问题在实践过程中的失误和不足

毛泽东在处理“三农”问题上,既取得了一定的理论贡献和成就,又在具体实践操作上存在失误和不足。建国后,他一方面强调消灭工农、城乡和地区这三大差别,另一方面又通过政府行为实施严格的

城乡隔绝政策,致使工农互斥、城乡对立。出于工业化以及缓解就业压力的需要,中国在 20 世纪 50 年代相继实行了一系列政策、制度,防止农民流向城市。如:(1)户口迁移制度。严格规定:凡没有城市劳动部门录用证明、学校录取证明或城市户口登记机关准予迁入证明者都不能由农村进入城市。(2)粮油供应制度。1953 年以后,随着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推行,中国开始实行粮油供应制度。这一制度原则上规定国家只负责城市非农户口的粮油供应,不负责农业人口的粮油供应。这在客观上形成了吃商品粮的城市人口和不吃商品粮的农村人口。(3)劳动用工制度。自 20 世纪 50 年代初实行的劳动用工制度原则上只负责城市非农业人口的就业安置,不允许农村人口进入城市谋求职业。明确规定城市各单位一律不得私自从农村中招工和私自录用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民,甚至还规定临时工必须尽量在当地城市中招用。这使得农民务农、市民务工成为天经地义的社会分工。

城乡隔绝政策的推行严重地阻碍了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不仅未能消除三大差别,而且使其进一步扩大;更为严重的是,它使得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被束缚在土地上,不能充分转移出来,降低了农村劳动生产率,使得中国农业继续走“内卷化”的道路。投入在土地上的劳动力越来越多,产量虽有所提高但效率却在下降,从而人均产量变得越来越少,于是在无其他收入来源的情况下,农民变得更加贫穷。不仅如此,在城乡隔绝政策下国家还事实上实行了掠夺农民的价格“剪刀差”政策,使本来不景气的农业与处于贫困状态中的农民的处境雪上加霜,严重地阻碍了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农村经济的发展。

建国后,随着国民经济大规模建设的展开,落后的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已不能满足工业化建设的需要,在一些大、中城市出现了程度不同的粮食购销紧张问题。为了缓和粮食购销紧张的矛盾,保证工业化建设,国家实行统购统销政策。统购统销政策虽对保证供给、支持工业化建设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其后果也是十分严重的:(1)统购统销政策人为地违背价值规律在农产品购销中的作用,给农村经济和农业生产带来了极其不利的影响。(2)统购统销政策的实施中还存在着统得过死,强征强购等问题,不仅严重影响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而且也恶化了国家同农民的关系。

建国后,由于毛泽东不太了解中国人口增长的历史特点,不太认识人口增长的惯性规律,又无视马

寅初等人的重大建议,从而客观上导致了 20 世纪 50~60 年代的两次生育高峰的幅度大大提高。尽管后来毛泽东醒悟并加以纠正,但中国人口倍增的态势已经形成。可以说,20 世纪 50~60 年代人口政策失误直接导致了农村人口过多、素质过低,造成了人口与农业资源、粮食生产和生态环境之间的多重危机,并且这一多重危机将长期制约着处于贫困状态中的农村人口摆脱贫困。因为不管农民摆脱贫困的动机多么强烈,初衷多么美好,但其行为却离不开置身于其中的结构性因素(规则与资源)的约束。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国,任何人口政策的失误所带来的后果都是深远的,其代价更是巨大的。

建国后,对于出身于农民家庭的毛泽东来说,深知农民的艰辛,迫切地要改变农民的现状使农民尽快地富起来的心情十分强烈。但由于他对社会主义本质和生产关系反作用生产力理解的偏差,片面追求公有化的程度,急于求成,再加上对群众路线的不自觉的误解和误用:一方面,试图继续用战争年代的群众运动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对群众(主体是农民)中落后心理和自发意识缺乏清醒的认识,甚至是盲从。于是在 1958 年轻率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希望通过社会主义集体的力量,克服个体农民的脆弱性,使全体农民走上共同富裕的大道。在战略步骤上,主张从均贫走上均富,结果导致了浮夸风、瞎指挥和“共产风”盛行,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给农村生产力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尽管后来进行了纠正,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问题未能得到根本解决。

这一深刻的教训告诉我们:农村生产关系的变化与发展,必须坚持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基本原理。如果以牺牲客观规律为代价却迎合了群众迫切要求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的社会情绪和社会愿望,就蕴涵了某种失败的必然性。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主要教训就是违背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原理。同时也说明,世界观决定思想方法,思想方法又制约了具体的领导方法、工作方法等。由于世界观科学程度不同,观察、分析、研究问题的方法也就不同。在正确的世界观指导下运用正确的方法保证实践的科学性,才能达到认识世界的目的。相反,如果世界观和方法论存在非科学性,任凭主体者实践的动机是如何的美好,愿望是怎样的真诚,都可能导致目的和方法的背离,甚至是南辕北辙,这是历史的辩证法。

当然,毛泽东探索解决“三农”问题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中期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当时对这一问题无论是理论上的认识还是实践上的认识,都不可能像今天这样充分和深刻,因而这种探索难免带有很大的局限性,也难免有失误。我们不应过分苛求一位探索者,因为探索真理终究比占有真理更可贵。无论如何,毛泽东毕竟迈出了探索的第一步,不论是经验还是教训,都已成为一笔宝贵的思想财富,这些都为我们在今天处理“三农”问题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三、从毛泽东探索解决“三农”问题中得到的借鉴和启示

“三农”问题的产生,既有历史积淀的因素,又有许多现实的复杂原因。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做到充分的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具体分析,找出症结所在,做到有的放矢、对症下药。对待“三农”问题,我们既要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又要避免盲目与冲动,做到客观理性的分析,遵循客观规律,防止走极端化的错误。鉴于“三农”问题形成的历史原因,解决这一问题,必须调整工业倾斜政策,消除人为剪刀差,消除“一国两策”政策,破除二元社会结构,建立起一套城乡统筹的经济社会体制,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信息体系和政策体系,决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其实,“三农”问题说到底还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说到底还是收入问题。要解决农业问题,必须靠工业化;要解决农民问题,必须靠非农民化;要解决农村问题,必须靠城镇。要使农民增收,就应减少农民;要使农业现代化,就得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农村城镇化是持续增加农民收入的关键。

解决“三农”问题,必须“把握国情”,“了解农村”,“尊重农民”。加大对农业投入在财政总支出中的比重。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生态环境和生产条件,从根本上改变基础脆弱、后劲不足、抗灾能力下降的局面。全面推行生态农业建设,实现经济与生态的良性循环。免除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和乡镇的统筹等费。放开城市就业,允许农民进城务工经商,取消城市限制农民进城的一切歧视性政策,给农民以国民待遇。同时加强农村教育体系建

设,发展农村的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从根本上提高农民素质,以适应农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加强农业科研和技术推广体系建设,把农业和农村经济真正转入依靠科学技术进步的轨道上来。扔掉户籍制度,让人口尤其是农村人口合理有序流动。

必须高度重视“三农”问题,因为它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是重大的政治问题。老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正是强调政治的微妙,强调要照顾到每一个方面,并在其间保持平衡;而不能只是看到一面,固执于一极。没有一个多元的政治架构(何况农民的巨大人口比例),政府的生存空间和操作空间就极易于受到挤压,难以左右逢源。再则,“三农”问题,也关系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中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近七成,如果农民利益解决不好,就很难说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如果广大农民不能进入小康;就难以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如果“三农”问题解决不好,再发达的城市经济也只是漂浮在小农经济汪洋大海上的小块绿洲,大海风浪一起,绿洲也就会随之倾覆。

总之,解决好“三农”问题,不仅需要政府所为,而且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我们都应抱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态度,群策群力,共商国是,彻底解决这一问题,这也是对伟人毛泽东的最好纪念。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九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 [3]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一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 [4] 列宁全集(第十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
- [5] 斯大林全集(第八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
- [6] 中国共产党80年事典[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 [7]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8]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9]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责任编辑 杨彬智]